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三辑)

——配合国家基本建设专集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陈永志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集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几年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所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及其他相关研究文章。内容涵盖新石器时代至辽、金、元、明时期的各个阶段,涉及到内蒙古地区的一些主要古文化遗存及重大的学术课题,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最新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

本书可供考古、历史、古文字等方面的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三辑):配合国家基本建设专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陈永志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ISBN 7-03-013984-4

I. 内… II. ①内… ②陈… III. 文物—考古—内蒙古—文集
IV. K872.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5131 号

责任编辑:杨新改 刘卓澄 / 责任校对:钟 洋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陈 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4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889×1194 1/16

200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4 1/4

印数:1—2 000 字数:850 000

定价:1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审 定 稿:陈永志

资料编辑:李恩瑞 张文平 张红星

宋国栋 李 强 盖志勇

绘 图:李 宁 李 力 郝晓菲

拓 片:李 威

摄 影:小 放 陈永志 孔 群

盖志勇 钱玉成 石俊贵

序 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的文物考古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以配合国家基本建设为主的抢救性考古发掘，现已成为新时期文物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祖国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内蒙古的文物考古事业也以此为标志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今年，时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十华诞，作为展示我区近年来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文物考古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三辑）即将付梓。伏案而思，我区文物工作者筚路蓝缕、风餐露宿、跋山涉水、挥汗如雨……一个个令人震撼的感人场面历历在目，令人肃然起敬。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祖国北部边疆，幅员辽阔，呈东北向西南斜伸的狭长形，东西长4000余公里，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区内地貌复杂多样，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沙漠戈壁纵横交错，虽地处中纬度地区，大部分属中温带大陆性气候，但自然环境差异甚大。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地质地貌、差异显著的自然环境，使内蒙古地区成为较为独特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的交错碰撞地带，同时也决定了其所孕育古代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中华民族悠久雄壮的历史长河中展现出一幅幅丰富多彩、绚丽缤纷的宏大画卷。

早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在内蒙古这块辽阔而神秘的土地上就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在呼和浩特市郊区大窑村发现的石器制造场，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50万年之久；在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的河套人及古生物化石，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万~3万年。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内蒙古地区形成了三大系统的文化区域。一个是以西辽河流域为主的东南部地区，形成了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基本发展序列；一个是以黄河流域为主的中南部地区，形成了阿善文化→白泥窑子文化→海生不浪文化→庙子沟文化→老虎山文化→朱开沟文化的基本框架；

另一个是大兴安岭以北至阴山以北这个东北—北部—西部的弧形地带，形成了以细石器为特征、以狩猎游牧业为主的文化区域。青铜时代以降，内蒙古地区一直活跃着许多狩猎或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先后有山戎、北狄、林胡、楼烦、东胡、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库莫奚、室韦、回鹘、女真、党项、蒙古、回回、满族等。这些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其中部分民族还建立了政权。他们既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又与周边及中原各民族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们是祖国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为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建立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活跃在内蒙古地区的古代先民，在创造了光辉灿烂文化的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古迹。目前，内蒙古地区已经查明的不可移动的古文化遗存达 15 000 处之多。这些遗存或为地下，或为地上，涵盖遗址、墓葬、长城、建筑、岩画、雕塑、碑刻等各个方面，它们像一篇篇隽永绚丽的长篇史诗，默默地为世人展示着内蒙古地区悠远浑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一大批基本建设项目上马实施，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和基本建设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对于文物工作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生产建设中如何保护我们祖先留下的珍贵文物，科学有效地进行文物考古研究工作，已经成为广大文物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在“鱼”和“熊掌”的抉择中，国家“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生产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等一系列文物工作方针政策，为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指明了方向。经过广大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一些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如配合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库、南水北调等大型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考古发掘项目，均为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进行文物考古研究的成功范例。

在内蒙古地区，近年来也有许多大型的基本建设工程，如托克托县电厂、岱海电厂、国华电厂、万家寨水利枢纽、尼尔基水利枢纽、丰准铁路、集通铁路、110 国道、209 国道、达丰超高压输变电路、呼集老高速公路等。这些建设工程有的已经结束，有的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配合这些基本建设工程而进行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克服了工期短、任务重、人员和资金短缺、环境恶劣等重重困难，勤恳努力，兢兢业业，保护和抢救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古迹，做到了经济建设、文物保护、考古研究三不误，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对考古发掘成果研究、消化，撰写出相应的报告、论文。这部《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三辑）的编辑出版，即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国家基本建设的一部力作，为我区今后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进行文物考古发掘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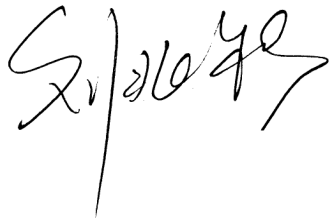
的范例。

纵观这本文集，主要有如下特点：其一，内容广泛，时间跨度大，时代延续性较强。从内容来看，其涉及有遗址、墓葬、长城、古代建筑、雕塑等诸多方面；从时代来讲，涵盖新石器时代、战国、秦、汉、代魏、隋唐、金、元、明等诸多时段。其二，材料新颖，资料性强。所发表材料基本为近年来配合基本建设所发掘出土的最新资料，其涉及到的遗址几乎均为首次考古发掘，因此这些材料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三，文中许多观点不拘泥于旧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黑水泉遗址行政所属、古城村古城的始建年代、沙尔沁古城的性质等诸多问题均提出了新的、较为客观的看法。

今年，时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五十华诞，这本文集的编辑出版是五十年光辉历程中的一个亮点，尽管其称不上十全十美，但也是我区文物工作者多年来用辛勤与汗水换来的重大成果，体现了我区基建考古的真实水平，对于完善我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具有重要的意义。她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全体职工辛勤耕耘的成功回报，是在所领导班子精诚团结、开拓进取的领导作风下取得的优秀成果。在这里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以及文博系统的同志们，向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长期奋战在文物考古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亲切的慰问，对于大力配合与支持我区文物考古事业的各基本建设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新世纪，新的征程，伴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的蓬勃发展，衷心地祝愿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世纪的征程上大展宏图，祝愿内蒙古自治区的文物考古事业蒸蒸日上、灿烂辉煌！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



2004年6月7日

前 言

内蒙古的文物考古事业，至今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回首所走过的道路，可谓艰辛而曲折。1949年以前，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文物考古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业待兴，在党和政府的关注下，1954年，成立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这是我区最早的文物考古工作机构。虽然人员构成较为简单，但却负责全区文物遗址的保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工作重心基本上是围绕着了解与调查内蒙古地区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而进行的。到了文革期间，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被迫停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又重新恢复。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经过近两代文物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不断努力，我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收获和丰硕成果，初步建立起了我区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和基本框架，其中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以及以后诸历史时期的文物考古研究均有了较大的突破，特别是在辽金元考古研究方面独具特色，成绩斐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和国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深入，综合国力迅速提高，社会主义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阶段。近年来，国家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增多，从南水北调，到西气东输；从西煤东运，到西电东送；从黄河小浪底库区建设，到三峡工程，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因此，积极地服务于经济建设，努力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与时俱进，成为文物工作者当前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中心任务，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基建考古从而也就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时代前进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国家文物局及时调整了今后文物工作的重点和方向，制定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文物保护工作的客观要求。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基建考古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许多全国重大的考古发现都是在配合基建过程中发现的。

与全国的整体形势一样，内蒙古自治区每年也有很多大型的基本建设项目陆续

进行，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建设项目日益增多，公路、铁路、水库、油田、电厂等一系列项目纷纷投产建设，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已经成为我区文物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过程中，我们弊中求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许多可喜可贺的成绩。以前我们曾成功地进行了平双公路、呼包高速公路、集通铁路、丰准铁路、准东铁路、万家寨水利枢纽等建设工程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保护和抢救了许多珍贵的古文化遗址，相关的学术报告多已发表。近年来又配合尼尔基水利枢纽、109国道、110国道、208国道、209国道、210国道、包头南绕城公路、东大公路、乌兰水泥厂、托县电厂、达丰超高压输变电路、呼集老高速公路等建设工程，对工程建设地带内的古文物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亦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解决了一些重大学术问题。如通过对卓资县城卜子古城的发掘，第一次发现赵国的文字，将其时代推定在战国中晚期；通过对东胜柴登乡秦直道东侧建筑台地的考古发掘，将原来认为障城遗迹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更正；通过对陶卜齐古城的考古发掘，发现“安陶”字样的空心砖，纠正了学术界将汉安陶县定位于美岱二十家子古城的错误结论；通过对托克托县黑水泉遗址的发掘研究，发现带有“武泉”字样的戳印，推断其与汉代武泉县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沙尔沁古城的发掘，更正了古城为辽代的错误认识；通过对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战国至辽金元不同时期的遗迹、遗物，确定其为内蒙古地区沿用时间最长的古城；通过对集宁路古城的考古发掘，发现中原各大窑系的瓷器以及完整的市肆遗址和多处器物窖藏，集宁路古城遗址由此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些都是我区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考古研究所取得的骄人成绩。

长期以来，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与出版多较为滞后，周期过长，这已是考古界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及时调整文物工作重心，将此项工作作为重点，力求解决日益严重的资料积压和报告出版滞后的问题。虽然目前这一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如彻底解决还需要一定的过程，我区也不例外。多年来，由于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众多、任务繁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亦曾存在着考古报告编写滞后的现象，至今仍然有一部分考古发掘项目的报告尚未编写出版。仅就《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而言，目前我们只出版了一、二两辑，从第二辑1997年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个年头，这本第三辑的问世虽略有姗姗来迟之感，但毕竟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编辑出版考古报告方面所迈出的可喜的一大步，也颇令人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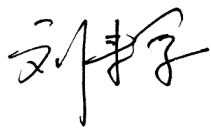
这本文集以近年来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果为主要内容，可以说是内蒙古地区近年来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文物考古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我们而言，它既是一个收获，也是长期奋斗在文物战线上的同志们多年来辛勤与汗水的结

晶和刻苦工作的见证。这本文集最大的特点是以发表基本材料为主。文集刊发的均为近年来在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过程中进行文物调查、勘探、考古发掘的第一手资料。如文中所涉及到的达拉特旗草原村遗址、托克托县耿庆沟上游支流西沟与南沟沟畔遗址、黑水泉遗址及墓葬、清水河县城嘴子遗址、卓资县城卜子古城、包头市麻池三队遗址、伊金霍洛旗王家坡窑址、察哈尔右翼后旗头道湾古城、韩元店元代古城、和林格尔县红山口遗址、土默特左旗沙尔沁古城等，均为首次进行的考古发掘，东胜柴登乡城梁段秦直道、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等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第一次正式进行的考古发掘。所以，这些材料对我区新石器时代以后诸考古学文化的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在文集中还附录了一些相关方面的研究性文章，丰富了文集的内容。同时文集中许多新观点、认识，较之以前有了诸多变化，纠正了我们以往的一些错误认识。

今年欣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诞生五十周年，这本文集的编辑出版，可谓是为五十年大庆献上的一份厚礼，有着较为特殊的意义。她标志着我区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文物考古研究的成熟与发展，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水平的逐步提高。

五十年风雨历程，半个世纪的磨炼涤荡，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祖国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春风沐浴下，经历了初创和发展，现正在走向成熟与辉煌。今后我们将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以巨大的工作成绩来回报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厚爱与支持，为我区的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



2004年6月17日

目 录

序言	刘兆和 (i)
前言	刘来学 (v)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主要 收获	陈永志 (1)
达拉特旗草原村遗址调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达拉特旗文物管理所 (16)
托克托县耿庆沟上游支流西沟与南沟沟畔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托克托县博物馆 (25)
达拉特旗瓦窑村遗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达拉特旗文物管理所 (51)
托克托县后郝家窑遗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托克托县博物馆 (72)
清水河县城嘴子遗址发掘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81)
卓资县城卜子古城遗址调查发掘简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乌兰察布博物馆 (129)
东胜城梁段秦直道遗址发掘简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文物管理所 (144)

托克托县黑水泉遗址发掘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托克托县博物馆	(153)
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遗址发掘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托克托县博物馆	(218)
包头市麻池三队遗址发掘简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包头市文物管理处	(262)
伊金霍洛旗王家坡汉代窑址发掘简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伊金霍洛旗文物管理所	(278)
托克托县黑水泉汉代墓葬清理简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托克托县博物馆	(294)
包头市张龙圪旦汉墓第二次发掘简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包头市文物管理处	(303)
苏尼特右旗新民乡全胜段金界壕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锡林郭勒盟文物站 苏尼特右旗文物管理所	(313)
察哈尔右翼后旗头道湾古城遗址发掘简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乌兰察布博物馆 察哈尔右翼后旗文物管理所	(326)
察哈尔右翼后旗边墙路及其周边遗址的调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察哈尔右翼后旗文化管理中心	(352)
察哈尔右翼后旗韩元店元代古城遗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察哈尔右翼后旗文化管理中心	(359)
和林格尔县红山口遗址发掘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和林格尔县文物管理所	(369)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沙尔沁古城发掘简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415)
包头市尔甲亥明代寺庙遗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425)
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窑沟村明代烽燧址的清理 ...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和林格尔县文物管理所	(430)
赵宝沟文化动物纹图案的神话学考察	陆思贤	(434)
试论北方民族史的一些共性问题	张文平	(447)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两位女画家兼舞蹈家	陆思贤	(456)
包头汉墓的分期	张海斌	(466)
陕北汉代画像石兴起原因初探	李 强	(501)
关于“弹汗山”与“歆仇水”的地望	李兴盛 郝晓菲	(510)
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出土的唐代墓志与东受降城的地望	石俊贵 刘 燕	(513)
从汪古部考古发现看元代内蒙古草原萨满教对景教的影响	盖山林	(517)
内蒙古发现的两枚元代八思巴字长牌考释		
——兼论科尔沁右翼中旗色音花元代五体文夜巡牌	陈永志	(524)
后记		(53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国家基本建设 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主要收获

陈永志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文物考古研究工作是伴随着自治区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壮大而逐步开展的,最早始于1954年,当时为配合包钢生产建设,内蒙古文物工作组对包头郊区的11座汉墓进行了考古发掘,从而开创了内蒙古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先河^[1]。1958年,配合集张铁路的工程建设,内蒙古文物工作组曾对察哈尔右翼前旗集宁路古城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对古城的城垣及城市布局进行了初步勘测,发掘清理出一批墓葬及窖藏^[2]。1959~1961年,配合呼和浩特黄合少水库的建设,对美岱二十家子汉代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对城内外汉代、唐代、辽代及金代的遗存进行了大面积的揭露^[3]。1959年,配合农田基本建设,对宁城县大明城辽中京城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初步了解了辽中京城的城市布局及城内文化堆积的状况^[4]。1960年,配合农业生产建设,又对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战国、汉、北魏和唐代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5]。

上述进行的几项大规模考古发掘,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分布在内蒙古地区的古代城市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也是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进行文物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发端与肇创,对于研究内蒙古地区战国、两汉、隋唐、辽金元时期的城镇建置具有重要的意义。1987~1988年,配合平双公路的建设,对赤峰市宁城县三座店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国家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后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准格尔煤田、集通铁路、丰准铁路、大准铁路的建设与上马,与之相应的文物考古发掘工作全面展开,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所进行的考古发掘逐渐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文物保护研究工作的主流。在内蒙古的东部,对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富河、小河沿、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等一系列原始文化遗存的揭露,在内蒙古中南部对黄河两岸仰韶至夏商诸阶段文化遗存的清理与发掘,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已基本上形成^[6]。1994~1998年,配合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万家寨水利枢纽的考古发掘工作被誉为是内蒙古的“小三峡工程”,考古工作量之大、涉及面之广、成果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通过对洪水沟、寨子圪旦、西岔遗址、城坡古城、下城湾古城等一系列遗址的大面积考古发掘,对内蒙古中南部的考古学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考古报告集》,它是我区第一部配合国家基本建设文物考古研

究的专著，对于进一步完善内蒙古中南部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具有重要意义^[7]。其后，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在内蒙古地区的基本建设项目日益增多，一系列电厂、公路、铁路以及经济开发园区等建设项目的实施，内蒙古配合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考古发掘工作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如配合 110 国道发掘的陶卜齐古城、城卜子古城遗址，210 国道的瓦窑与麻池遗址，109 国道的秦直道遗址，托克托县电厂的黑水泉、红山口遗址，乌兰水泥厂的头道湾古城遗址，208 国道的金界壕、韩元店古城遗址，209 国道的土城子古城遗址，达丰（达拉特旗—丰镇市）输电线路的云中古城遗址，集老（集宁—老爷庙）高速公路的集宁路古城遗址，省际大通道的上京城郊墓葬区，尼尔基水库的金代边堡等等，通过国家基本建设项目这样一个大的平台，将内蒙古不同地区、不同环境的一系列古代文化遗存联系起来，并以“点”和“面”的形式进行全面系统地揭露与研究。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发掘报告与研究成果的累累面世，极大地丰富了内蒙古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对于促进内蒙古地区诸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考古学体系逐渐形成并完善。以下分几个方面略作论述。

一、原始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黄河两岸是古人类活动的频繁地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1999 年 6 月，为配合 210 国道的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黄河南岸的达拉特旗草原村、瓦窑村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勘探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在草原村遗址，首次发现一处位于高台上的石器制造场，周围分布着打制石器的成品及半成品，四周堆放一些从沙砾中暴露出来未经过打制的自然石块，质地坚硬致密。打制成型的石器主要有石斧、石磨盘、石镞、尖状器、刮削器以及石核、石叶等。在石器制造场周围发现有仰韶文化典型的陶器红陶钵、夹砂罐等，以此推测草原村遗址应是黄河西岸一处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在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制造场对于进一步研究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的成型与制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8]。瓦窑村仰韶文化遗址最早发现于 1963 年^[9]，此次调查发现一处陶窑与房址，出土有喇叭口尖底瓶、夹砂侈口罐、彩陶折腹钵等一批陶器。通过器物类型分析，初步认定该遗址属于半坡四期早段、中段、晚段三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而发现的筒形罐与菱形网格纹彩陶说明该原始文化与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10]。为配合托克托县电厂、贮灰厂、水厂的建设，对黄河北岸原始文化遗存的调查与发掘，是对黄河流域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的再认识。对后郝家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侈口罐、小口双耳罐、折腹钵、敞口钵等陶器，其器形的演变基本上涵盖了海生不浪类型的三个阶段，从而为该文化类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资料^[11]。对耿庆沟附近 7 个地点的考古调查与试掘，初步摸清了托克托地区黄河北岸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分布状况。第 1 地点是相当于凉城红台坡下、包头阿善一期文化遗存，含有半坡类型及后岗一期的文化因素，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第 2 地点出土陶器与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出土的陶器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第 3、4 地点出土的器物与海生不浪类型三个阶段的文化特点相同，属于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第 5、6 地点与第

7 地点文化遗存相当于战国至汉代^[12]。对黄河北岸耿庆沟地区的考古调查与试掘,是我区文物工作者首次对托克托县境内黄河北岸进行大规模的遗址调查,对于进一步认识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991年,为配合呼包(呼和浩特—包头)高速公路建设,对包头市郊区纳太遗址进行了考古试掘,清理一处半地穴式房址,出土有小口瓮、双耳壶等陶器,伴出有单孔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等生产工具,陶器外壁拍印有交错粗篮纹,属于阿善三期文化类型,晚于庙子沟文化遗存,早于西园四期文化遗存,具体年代约公元前3000~前2500年^[13]。1998年7月,为配合黄河公路建设,对清水河县城嘴子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土了一批相当于永兴店文化系统的遗迹、遗物。遗迹有白灰面房址、覆斗形窖穴和石板墓,遗物主要有直口瓮、高领折肩罐、鼓肩罐及双釜鬲等。此类遗迹、器物的出土,填补了永兴店文化由阿善三期文化发展而来的早段空白,即属于永兴店文化的第一期,从而将永兴店文化的二期扩展到三期。另外,在城嘴子古城遗址中还发现了龙山至夏商时期文化遗存,以出土的盆形鬲(ⅡT1⑤:3、ⅡT1⑤:7)、直口瓮(ⅡH45:2、ⅡT2⑤:4)为代表,这些陶器的出土,为进一步研究内蒙古中南部龙山至夏商阶段诸原始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14]。总之,配合国家基本建设在内蒙古黄河流域进行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为进一步认识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内涵、完善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二、古代城市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城市是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城市的建置、成熟与发展,代表着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水平。通过对古代城市制度的考古学研究,可以窥见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1992年,配合110国道的建设,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卓资县城卜子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城卜子古城系赵北长城边侧的一处障城遗址,扼守在大黑河通道的东北出口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此次发掘对城垣进行了解剖,在城内进行了局部试掘,清理出土了陶釜、陶豆、陶钵等一批文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收获是在一匣钵外壁上发现了一组赵国文字,计9个字,以硬物刻划于器壁之上,为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之文字形体,可辨识的有“肖”、“立”、“宫”等字,其中“肖”应为“赵”字的古体。《史记·匈奴列传》记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城卜子古城出土的这组文字,既说明城卜子古城与赵国有着某种的关系,也说明它是战国时期赵国长城边侧的一处重要障城遗迹,系赵国古阴山北麓赵北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5]。这是我区文物工作者首次对战国时期的障城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由此认定该城址的城垣结构、城内建筑特征以及城内出土陶器的特点成为判断阴山地区赵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参证。

1998年7月,为配合黄河公路的建设,对清水河县城嘴子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城嘴子古城学界认定其为汉代定襄郡的桐过县县治所在^[16]。通过此次考古发掘,发现一批战国时期的房址、陶窑和墓葬等,还伴出有饰交错绳纹的陶釜、陶盆、陶罐、陶碗以及铜带钩、玉环等器物,时代特征明显。汉代的文化遗产也占相当部分,遗迹有房址、灰坑,遗物有敞口罐、敞口盆、

盘口壶、折腹碗及铁刀、铁镰等器物，通过对城墙结构及城内遗物的分析认定，城嘴子古城始建于战国，汉代对古城的南北城墙加固，重新修筑了东城墙，现在的城垣结构及城市布局系西汉时定形。城嘴子古城规模宏大，出土遗物丰富，根据城垣情况以及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判断其为汉代定襄郡桐过县的县治所在应是正确的^[17]。

2000年5月，为配合托克托电厂铁路专用线建设，对黑水泉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保存较好的水井、陶窑、沉腐池、陶土池以及数量较多的瓮棺葬等遗迹，出土有陶托、陶拍、陶支架等成套制陶工具，并伴出有陶壶、陶盆、陶瓮、陶钵等生活用具，还出土有半两及五铢钱币。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一片戳印有“武泉”字样的陶片，为准确判断该遗址的性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遗址内大量制陶设施及制陶工具的发现，说明该遗址是一处汉代的陶器作坊所在地。在黑水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有人的姓氏或其他较为特别的标识，如有“张”、“王”、“十”等字。特别是在一些制陶工具上曾反复刻有人的姓氏“张”字，这些字体刻划的较为草率随便，与官方正规的戳印有着明显的不同，具有画押的味道，这说明这些陶器的所有者即是“张”、“王”或其他姓氏的陶工。在制陶工具陶托上发现人的姓氏，说明手工业生产者对生产工具的重视及所拥有的权力，也说明当时的制陶业虽然由官府掌握，但陶工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放松，其所生产出来的陶器不仅由官方掌握销售，也有部分陶器流向民间市场，喻示着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在陶器成品上戳印有“武泉”城市名称，既说明汉代的制陶业仍属于官方所管辖，也证实了黑水泉遗址所在地即是汉代定襄郡武泉县的县治所在地。关于武泉县的确切地望，学界有多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卓资县三道营乡三道营古城^[18]，一种认为是呼和浩特郊区的塔布秃古城^[19]，黑水泉遗址中出土的“武泉”字样的陶片，不仅解决了黑水泉遗址的具体县属，同时也为最终确立汉代定襄郡武泉县城址的确切地望提供了直接的实物依据^[20]。

1994年，为配合110国道的建设，对呼和浩特市榆林镇陶卜齐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对城垣进行清理解剖，对城内重点地段进行了试掘，初步确定了古城的具体建筑时间及性质。古城城墙断面显示，古城明显地经过两大建筑阶段，第一阶段墙体内出土有战国时期的弦断绳纹陶片；第二阶段附筑了马面及城墙，坍塌部分出土有汉代的陶片及空心砖残块，在一空心砖表面还发现有以硬物刻划的“安陶”二字。上述发掘情况表明，陶卜齐古城始建于战国时期，根据古城所处大黑河道阴山西端入口与土默川平原相衔接的地理位置特点判断，其性质属于赵国阴山东麓一处长城边侧的重要障城遗址。汉代初年，汉武帝从云中郡另划出定襄郡，此城沿用演变安陶县县治所在。在城内出土带有“市”字的陶片是其附证^[21]。定襄郡安陶县县治所在学界曾确定为呼和浩特市美岱二十家子古城^[22]，通过此次出土“安陶”字样的空心砖，纠正了上述错误结论，也为正确地推断汉代其他郡县的相对位置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实物证据^[23]。

1997年，配合达丰输电线路、209国道的工程建设，对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彩版五二，2）。在城内分别对中城、北城及南城的重要地点进行了揭露。在北城，发现一处完整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在其附近发现有多处水井，在这些水井及作坊遗址中发现一批完整及可复原瓷器，总数达300余件，其中出土一件属南方越窑的瓷碗，青绿釉，玉璧形底，为类秘色瓷，这是在北方草原地区第一次发现唐代南方越窑的青瓷，十分罕见。另外，还出土有

陶器、瓷器以及骨制品等重要文物，其中邢窑白瓷发现上百件之多，器形以碗为主，釉色青白，反映了隋唐时期白瓷在北方草原地区兴起及发展的状况。在中城，清理出一处完整的寺庙建筑基址，基址上排列有完整的桑墩及残存的柱础，在寺庙遗址外侧发现有金元时期的火炕，还发现有完整的贮粮窖穴，并在建筑基址及一处水井内发现大量的战国至辽金元时期的瓦当。这批瓦当保存完好，当面装饰内容新颖奇特，为进一步研究土城子古城不同时期的城市建筑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物资料^[24]。在南城，发现有战国至北魏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有陶釜、折腹碗、陶盆及带有篦点纹的北魏陶壶等遗物。北魏陶器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首次将北魏时期的遗物从遗址中分辨出来，对于正确地认定北魏时期的文化遗存增添了新的佐证材料。总之，对土城子古城进行的考古发掘，在城内对不同地区进行大面积的揭露，城内战国时期遗迹、遗物的发现，将土城子古城城镇建置的历史上溯至战国时期。金元时期遗迹、遗物的发现，又将其下限锁定至元代。由此认定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是内蒙古地区沿用时间最长、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的古城。特别是在南城内发现了北魏时期的遗迹、遗物，内外戳印篦点纹的陶壶、莲花纹瓦当等器物的出土，为正确地判定北魏盛乐都城的确切地望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25]。

为了配合达丰输电线路工程建设，2001年10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托克托县博物馆对古城村云中古城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以往文物工作者对云中古城周边地区的墓葬进行过小范围的清理与调查，取得了一些重要发现^[26]。此次发掘是第一次对云中古城城内进行大面积的揭露。通过本次发掘，对城内地层堆积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对古城的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是内蒙古西部地区建立时间最早、规模较大的城址之一^[27]。其始建于战国，战国至两汉时期称之为云中郡，代政权以此为政治中心，北魏在此设立云中镇。古城历经战国、秦、两汉、代魏，为时九百余载。关于云中城的始建年代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古城为战国时期赵武侯所建，亦有学者认为古城系战国赵武灵王所建^[28]，遗址中出土的赵国弦纹瓦当，发现的大量战国时期赵、燕、齐的刀币、布币^[29]，为云中城的具体建筑年代提供了翔实的实物佐证。秦始皇十三年（公元前234年），秦国在此设立了云中郡以防匈奴。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初并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云中城为其中之一，其辖境与赵国时基本相似。西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将云中分为云中、定襄二郡。20世纪80年代，在古城内曾发现过一些带有“云中”字样汉代陶片，本次发掘出土的A型I式釜上的“云”字与云中地区发现的带有“云中丞印”字样汉代铜印上的“云”字在写法和风格上完全一致，再次说明古城在汉代为云中郡治所云中城。本次发掘还出土了大量北魏时期的遗物，主要以陶器为主，有陶壶、陶罐、陶盆等。大件器物以轮制为主，纹饰有弦纹夹水波纹、联弧纹、压光暗纹、麻点纹和滚轮压印纹等，具有北魏中晚期的器物特点。除陶器外，还出土大量莲花纹、佛像纹瓦当，莲花、佛像图案精致细腻，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平，它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佛教空前繁荣的实际状况，另一方面也是北魏崇佛、敬佛思想在古代建筑上的真实体现。拓跋鲜卑建立代政权后，于建国三年（340年）移都于云中地区，云中城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北魏时期政治中心南移后，云中属朔州辖镇，驻守大青山以南的重要基地。云中城出土的这些遗迹、遗物，是这段历史的真实见证。

1995年，为配合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乌兰水泥厂的基础设施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盟博物馆、察哈尔右翼后旗文物管理所对察哈尔右翼后旗红格尔图乡头道湾古城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清理出的遗迹有房址、灰坑、灰沟等，房址较少，出土的遗物多生活类器皿，以瓷器、陶器为大宗。瓷器多为白瓷，以碗、盘最多。根据出土器物的特点判定，头道湾古城的年代应为金代。在头道湾古城的正南方5公里处有一道东西走向的金代界壕，规模较小，为主壕之附壕。附壕一般根据防卫需要从主线分出后再根据地势归入主线界壕，起辅助防卫作用，这是金界壕的网状防御体系，也称“硬防御系统”^[30]。与界壕相辅相成的防卫措施是在界壕内外侧建有环星式分布的戍堡与关城^[31]，即史书记载的“皆取直列置堡戍”^[32]。这些戍堡与关城既是屯兵之所，又是官兵们后勤供养基地。在界壕边侧每隔一定距离即设一处戍堡以达到“营栅相望，烽侯相应”^[33]之目的，从而构成了界壕之“软防御系统”。根据头道湾古城的位置及形制特点，应是金界壕边侧的边堡类城址，属于金界壕“软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址内出土的陶、瓷类器皿应为屯戍官兵使用的生活类器具；出土的铁农具，则是官兵建壕或从事农业生产时的使用工具。这些与《金史》记载的“用步卒穿壕筑障，起临潢左界北京路以为阻塞”^[34]的情况相符，由此可见内蒙古北部草原地区此类城址的功能和性质。

2000年5~8月，配合208国道的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察哈尔右翼后旗文物管理中心对韩元店古城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城址内发现成片分布的大量窖穴，在200平方米内发现了40个窖穴。这些窖穴加工精致光滑，其原始功能应是储藏粮食。通过对周围的钻探表明，城址其他地区还存在有大量的窖穴遗迹，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由此可见该城址存储粮食的数量。成吉思汗时期即在漠北阿鲁欢称海地区屯田，到了忽必烈时期，屯田成为元王朝重农措施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以后逐步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空前规模，当时的屯田总数在二十万顷以上^[35]。据《元史·兵志》“忠翊侍卫屯田”条记载：“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命各万户府，摘大同、隆兴、太原、平阳等处军人四千名，于燕只哥赤斤地面及红城周回，置立屯田，开耕荒田二千顷，仍命西京宣慰司领其事，后改立大同等处屯储万户府以领之。”其中红城屯田卫现已考证为今和林格尔县小红城古城^[36]，近期在浑河北岸小红城附近的红山口遗址发现了大量的贮粮窖穴进一步证明元红城屯田的事实^[37]。燕只哥赤斤是元代纳怜道元上都（今正蓝旗）至丰州（今呼和浩特）一段中的一站，推测当在今卓资县境内，但具体地点尚难考证^[38]。而韩元店古城地处草原南部边缘，属于中原农耕地区与漠北草原地带连接的枢纽地带。古城所在地北依低缓的山峦，坐落于山前广阔的平地之上，规模虽小，却建有大片的储粮窖穴，它应与“燕只哥赤斤地面”的军屯有关，可能是元代“燕只哥赤斤”屯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在该城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粗白瓷碗，普遍具有支钉叠烧、挖足过肩的特点，在碗圈足内心旋削凹处罩护一个小的釉点。上述瓷器特征，与山西浑源窑系的瓷器特点相符，说明这里出土的瓷器与山西浑源窑应有着密切关系^[39]，这对于研究元代瓷器的生产与销售亦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寻找元代“燕只哥赤斤”屯田的具体地点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线索^[40]。

2001年9~11月，为了配合209国道的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呼和浩

特沙尔沁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沙尔沁古城城市规模较小，城内没有普通居民居住的小型房址，只发现有大型的建筑台地与“工”字形房屋，说明沙尔沁古城是具有某种特殊功能的城市。关于古城的年代，以往学界曾认定其为辽代古城^[41]，根据沙尔沁古城城内建筑基址内出土瓦当的兽面装饰特点，与内蒙古敖汉旗白塔子乡元代武平县遗址出土的瓦当陶范^[42]兽面的装饰风格较为一致，也与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红山口元代遗址^[43]、察哈尔右翼前旗八苏木元代土城子古城、元代集宁路古城^[44]出土的兽面纹瓦当当面装饰风格相同。所以，沙尔沁古城应为元代古城无疑。元代路、州、县一级的城镇具有一定的建置规律与法式。沙尔沁古城从其规模上看不可能是元代县级以上的城市。古城地处阴山南麓，土默川平原的中部，其北大黑河自东向西注入黄河，其南有宝贝河注入大黑河，所处正为大黑河与宝贝河河水的扇形冲积地带，土质肥沃，水源丰富，适宜于农耕，根据古城内出土的铁犁铧等农具来判断，沙尔沁古城应与元代的农业生产有关。根据王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论政事书》中的记载：“今体访振武并丰州界河两傍，地广民稀，除营帐放牧外，其余荒闲地尚多，若差公于官僚踏视其宜，留兵营田。”振武所在地系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距沙尔沁古城仅5公里，“丰州”沿用辽之丰州建置，为今呼和浩特市白塔子古城，丰州界河应指今大黑河。所以，根据沙尔沁古城所处位置及城内出土的遗物来判断，此城应是元代的一处屯田卫所。该城内清理出土的大型“工”字形建筑基址应是官衙所在^[45]，而在这建筑基址中出土的兽面纹瓦当则更证实了这种判断。元代的瓦当当面装饰一般的情况是画面变小，边缘变宽，属模印成型，图案趋向退化。而沙尔沁古城出土瓦当，其规模与装饰内容正好相反，当径均为18厘米以上，兽面装饰较为大气而凝重，属于元代出土的瓦当之首，由此说明沙尔沁古城内房屋建筑的巨大，与其他城镇房屋的形制明显有别。这种房屋建筑与城市规模上的反差恰恰说明沙尔沁古城的特殊性，其具体原因是出于政府对粮食供应的需要，对屯田设施的重视，由此也反映出沙尔沁古城城市建筑的另一面^[46]。

2002年5月，为配合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集老高速公路的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盟博物馆、察哈尔右翼前旗文物管理所对集宁路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至2003年11月，发掘面积达22 045平方米，这是目前对元代“路”一级城市进行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遗迹、遗物。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城内房址、道路、灰坑、十字街道等遗迹保存完好，出土有瓷器、钱币、陶器、铜器、铁器、骨器、金银器等大量器物，还发现有多处器物窖藏。通过此次考古发掘，基本上弄清了古城的城市布局。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处完整的市肆遗址，并出土了一大批分属于钧窑系、磁州窑系、定窑系、耀州窑系、龙泉窑系、建窑系、景德镇窑系的大量瓷器，另外，还发现各类器物窖藏38处之多，主要有瓷器窖藏、铜铁器窖藏、钱币窖藏、金银器窖藏等。较为重要的发现是窖藏15出土釉里红玉壶春瓶1件，窖藏24出土景德镇湖田窑青花高足碗6件，窖藏19出土瓷器40件，窖藏32、33出土瓷器61件。城内纵横的道路及市肆遗址的清理发现，完整地再现了元代“路”一级城市的建筑布局及城内居民们生产、生活的真实状况。中原及南方各大窑系瓷器及钱币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大量发现，真实地反映了蒙元时期南北方贸易的往来状况。元代大量精美的“油滴”、“玳瑁”、“兔毫”、“天目釉”等结晶类瓷器及枢府瓷、釉里红、青花瓷器的发现，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手工业生产技

术的真实水平，也为元代瓷器的断代提供了一个准确的界定标尺。而多处器物窖藏及殓葬墓的发现，是蒙元时期复杂动荡的社会历史状况的真实折射，这对研究元代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7]。

三、古代特殊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1998年8~11月，为配合109国道的建设，内蒙古自治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文物管理所对鄂尔多斯市柴登乡城梁段秦直道遗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秦直道是连接关中平原与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重要通道，是秦王朝加强对蒙古边疆地区统治的纽带与桥梁，可谓中国交通史上的奇迹。直道始建于公元前212年，由关中的内史地区经陕西定边县、内蒙古的乌审旗、伊金霍洛旗、鄂尔多斯市的漫赖乡、柴登乡进入达拉特旗到包头市的麻池古城^[48]，全长1800公里。此次考古发掘重点对直道局部进行揭露，对直道边侧的一处建筑台地进行了清理。通过揭露发现，直道的修建较为草率，路基以一层黑色土填实找平，根据地势深浅不一，黑色土层之上再以黏度较大的红土掺上砂石夯实，不同地段土质、土色几乎一样，直道路面较为平整，宽约16米左右，路面车辙痕迹不明显。道路整体方向为南北向，部分地段随着地形的变化有不同程度的弯曲。此次对直道东侧的一个高台建筑基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发掘之后得知此地是一处陶窑遗址。在陶窑中发现大量的制陶工具及建筑构件，有回纹砖、板瓦、筒瓦及残瓦当等，另外还发现一些以陶坯制成的半月形瓦刀。出土的板瓦、筒瓦及瓦当粗大，厚重。部分瓦当与筒瓦相连，属于一次性模印成型。瓦当当面为关中咸阳地区常见的羊角形云纹及羊角形云纹的变体蘑菇形云纹，当心为菱形网纹，当面直径为18厘米左右，浑厚大气。上述建筑构件均为成品，未曾使用过。对于东胜市柴登乡秦直道遗址已有学者进行过初步研究，并认为位于城梁村直道边侧的高台地是一个障城遗址^[49]。通过此次发掘，结合对遗址周围进行的勘探，发现该台地周围并无城垣遗迹，围绕着台地分布的也只是厚厚的瓦砾堆积及烧过的木炭残渣，再结合清理出的窑址分析，此处应是直道边侧烧制砖瓦的一个大型窑址，而非是城障遗迹。秦王朝在内蒙古黄河岸边设九原郡，下辖44座县城，分布在黄河两岸及直道边侧的鄂尔多斯地区。这些草原城镇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在直道边侧建造如此规模的砖瓦窑场，其目的显然。根据板瓦、筒瓦上的戳印，这些窑场应当归朝廷直接控制，属于官营窑业。这些官营窑业的经营，对于供应古代内蒙古地区郡县级城镇及边堡烽燧的建设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次对直道遗迹的考古发掘，是首次利用考古发掘手段对秦代的直道遗迹进行的深入研究，收获颇大，为进一步了解秦直道的结构及功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50]。

1999年5月，配合210国道包东（包头—东胜）段的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对麻池三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陶器、铁器和钱币等一批重要器物。麻池三队遗址位于黄河北岸的一处高台地上，台地系砂石与瓦片、陶片掺合交织形成，文化层时有时无，但在遗址中发现大量的汉代陶碗、陶豆、豆盘及陶钵等器物。麻池三队遗址西距麻池古城仅5公里，遗址内出土的弦断绳纹陶盆，在麻池古城中也有发现^[51]，由此断定该

遗址应与麻池古城有某种联系。关于麻池古城的性质，学术界认为是秦汉北方长城地带具有防御性质的边城^[52]，从古城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恰好位于黄河北曲与大青山距离最近之处，扼守着东西交通要道，其防御性质显而易见。秦朝建立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度，与古阴山河套地区有关的是九原郡与云中两郡。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蒙恬率兵击走匈奴，占“河南地”之后，依黄河天险修筑了44座城镇，隶属于九原郡和云中郡。汉朝建立后曾继续沿用秦朝的郡县设置，并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数量众多的戍卫城镇，而麻池古城即是属于这些带有屯边防御性质的郡县级城市之一。根据古城的规模与位置特点以及麻池古城内出土的“万石”字样的戳印陶器，结合20年代麻池古城内出土的“万石”字样城砖^[53]，说明麻池古城的行政级别至少应是郡守以上的食俸^[54]。由此断定，麻池古城为秦代的九原郡、汉代的五原郡^[55]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麻池三队遗址自然也就可以定性为汉代五原郡城市外围的城郊遗存。此次对麻池三队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豆、陶钵等器物，为这一结论的认定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56]。

1998年4月间，配合东大（东胜—大柳塔）公路的建设工程，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伊金霍洛旗文物管理所对王家坡窑址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发掘。窑址位于王家坡村东南两条自然冲沟交汇的三角形地带，所处坡地东高西低，呈缓坡状，因长年风蚀和雨水冲刷，大部分遗迹裸露于地表，面积约1500平方米。此次共清理陶窑8座，灰坑1个，出土了少量的陶器、筒瓦、云纹瓦当等。8座陶窑中，除2座破坏严重、形制不完整外，绝大多数陶窑保存较好。平面呈亚腰形，类连珠状，由窑室和工作间组成。出土的遗物较为单一，主要为陶器残片。器类以高领罐为主，其次为宽沿盆、矮领侈口罐、折沿盆和小口壶等。王家坡窑址诸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只发现一组，器物组合与器物形态变化甚微，反映了该窑址虽然存在着相对的早晚关系，但延续时间较短。王家坡窑址早、晚两段陶窑的平面形制、建造方法基本相同，早段的为一个烟道，晚段的为三个烟道。早、晚两段的器物组合无明显的变化，惟器物的形态有所差异。根据出土器物的时代特点判断，早段在王莽至光武帝时期，即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晚段为光武帝至章帝时期，即东汉前期。汉代的窑址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发现较少，此次考古发掘，对于进一步研究内蒙古地区汉代陶业的具体情况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57]。

1998~2000年，为配合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托克托电厂铁路运输专线的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县文物管理所对和林格尔县红山口元代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在红山口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灰坑，总数计257座。这些灰坑规格划一，坑口较为规矩，坑壁坚硬光滑，坑底平整，圆形直筒式居多。这种形制的圆形灰坑，在浑河流域的元代遗址中较为多见^[58]，其形制的一致性与坑口、坑壁的特殊加工说明灰坑是当时人们有意而为之，不是普通的垃圾坑，应是一种特殊的窖穴。在遗址中，房屋基址均位于窖穴密集的边缘处，而大开间的房间布局说明是属于公共管理设施，非普通的居民住宅。元朝建立之后，为了供应驻军及官民的生活需要，在各地山川、江河两岸易耕地区广置屯田军，进行军屯，在漠南有应昌、砂井、净州屯田军，在内蒙古的土默川平原与浑河流域设有振武（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屯田军与红城（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小红城村）屯田卫。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

朝曾命万户府调发大同、隆兴、太原、平阳等处驻军到浑河流域进行屯田，设红城屯田卫，属西京宣尉司管辖。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元朝迁大同路军储所到红城屯田卫，此后，红城屯田卫成为元朝枢密院所管辖的重要军屯所在^[59]。红山口遗址距红城屯田卫所在的小红城村仅有5公里之遥，位于浑河西岸，周围地势肥沃平坦，适宜耕种垦殖，背山面河的地形特点又适合于建立储粮窖穴，由此判断，红山口遗址应是元朝红城屯田卫所辖的一处重要的粮食存储基地。大量的圆形灰坑，皆应当是储粮窖穴。窖穴周围大型的房址即是看管粮仓的军人居所。根据灰坑的数量来看，此处存储粮食的数量还是比较巨大的。元朝延祐五年（1318年），大青山后蒙古汪古部领地遭灾，元政府就曾“赖以红城屯田米赈净州、平地等处流民”^[60]，由此可见红城地区屯田的规模。对红山口遗址的清理发掘，第一次对元代的屯田设施贮粮窖穴进行大面积揭露，对于进一步研究元代的屯田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61]。

为配合208国道赛白段（赛汉塔拉—白音查干）工程建设，2000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锡林郭勒盟文物站、苏尼特右旗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对苏尼特右旗新新乡全胜村南的金界壕遗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通过发掘得知，界壕堤墙由红胶泥和白黏土及大量的碎石子混筑而成，无墙基，无夯筑痕迹。壕堑有主壕、副壕各一道，分别在堤墙两侧。外侧为主壕，内侧为副壕。主壕靠近堤墙，横断面近平底锅状，壕堑坡壁加工粗糙，较陡。副壕比较小，口宽不足2米，较浅，坡壁加工粗糙，较为平缓。戍堡位于堤墙的内侧，平面呈长方形，其北墙借用界壕墙体。四角有角台，呈圆丘状，略高于墙体。东、西、北三面城墙均无马面。堡内文化层比较单一，出土少量陶瓷片及动物骨骼。金代修筑的界壕有南、北两条主线，南线又分为内、外两条副线，本段界壕属于金界壕南线的内线^[62]。与前代长城相比，界壕的军事防御功能较为系统而先进，堤墙、壕堑、望台、戍堡、关城、关隘等防御设施是其建筑的全部。在堤墙外侧每隔一段距离或是在转折处加筑有望台，突出且高于墙体。沿线内侧每隔5~10公里筑戍堡一座，若干戍堡之间再筑更大的关城。在界壕所经过的南北交通要道上还设有关隘。本段界壕为南线界壕之西南路部分，属于“明昌新城”的一段，修筑于承安三年（1198年）。本段金界壕的特点是墙窄壕浅，这与章宗统治时期国势严重衰减有关。金王朝为了防御北方强大的蒙古各部，巩固边疆，修筑了连绵数千里的界壕。它不但体现了金王朝南攻北守的总体战略，同时也是金廷与蒙古战争节节败北的标志。但金界壕东西横跨2500余公里，单线总长7000余公里，实可称谓名副其实的地下万里长城^[63]，是中国军事防御工程史上的奇迹。以往学界对金界壕进行过初步研究^[64]，多以调查为主，对其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只在近期^[65]。通过本次发掘，我们对金界壕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对其筑造方法、结构特点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方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66]。

1999年11月，配合包头市南绕城公路的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对包头南郊的尔甲亥寺庙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尔甲亥遗址位于包头市郊区哈林格尔乡尔甲亥村西700多米处，为一块高出地面1米多的台地，地表散布着一些砖瓦等建筑构件。本次发掘主要是清理出大、小两个寺庙建筑遗址。发现有铺地方砖和柱础石等，散见的遗物有长条砖、琉璃瓦、虎头纹及龙纹瓦当等建筑构件。其中发现的龙纹瓦当是最具时代特点的

标型器。龙纹瓦当总体发展趋势是由粗糙渐趋华丽，其中龙爪由元代的三爪演变为清代的五爪^[67]。尔甲亥遗址出土的龙纹瓦当体现出明代“精细传神，龙身盘曲，极富动感”的特点^[68]。尔甲亥遗址出土长条砖的厚度与漠北额尔德尼昭建筑用砖的厚度相同，均为6厘米。这与同一时代建筑的营造法式趋于统一有关，统一的建筑模式必然要求建筑用砖尺寸的一致。大青山以南从呼和浩特到包头一带的土默川平原，在明代达延汗统一大漠蒙古各部之后，一直是土默特万户的领地范围。到16世纪后半叶俺达汗在位期间，从西藏引进黄教，大力推行，以1586年阿巴岱汗在哈刺和林兴建了著名的额尔德尼昭为标志^[69]。漠南漠北的蒙古地区一时广建寺院庙宇，包头尔甲亥的两处古遗址即是在这股潮流中兴建起来的两座寺庙遗址，对于进一步研究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70]。

2000年4月，配合和杀（和林格尔—杀虎口）公路的扩建工程，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和林格尔县文物管理所的协助下，对新店子乡窑沟村西明代长城外侧的一座烽燧址进行了抢救性解剖清理。窑沟村烽燧由台基和墩台两部分组成。整体呈顶小底大的金字塔形，外壁用砖或石块包砌。墩台台体由黄色黏土夯筑而成，土质坚硬，内夹杂料礓石和砂粒。整个墩台基础掩埋于地下。在墩台的南向坡面上筑有阶梯状的台阶，顶端平台上有红烧土痕迹。今内蒙古中南部分布的明代长城，分主边和次边两条。主边又称“头道边”，次边又称“二道边”。主边基本上是今内蒙古与山西省的分界线，东起今河北省与山西省交界处的马口市，西至内蒙古清水河县黄河东岸老牛湾为止，总长约480公里。在这些长城的外侧，一般筑有连接各大防守卫所的系列墩台，亦称“烽燧”，作为前线的瞭望哨。窑沟村烽燧址即属于这种性质，它是由山西杀虎口经玉林卫（和林格尔县榆林城遗址）至镇虏卫（今托克托县黑城遗址）、东胜卫（托克托县托克托城遗址）系列烽燧中的一个墩台。1449年，蒙古瓦剌首领也先率部南下，引发“土木之变”，之后，明朝对蒙古的战略主要采取守势，除修建加固一些主要长城外，还撤掉了一些卫所。玉林卫、镇虏卫、东胜卫等卫所退回边内，土默川平原一度归蒙古达延汗、阿拉坦汗控制，位于土默川平原与杀虎口的这段烽燧也就逐渐废弃，失去了它的原有的防御功能。窑沟烽燧的清理与解剖，对于进一步研究明代北部边疆地区的防御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71]。

四、古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

1997年，配合达丰输电线路、209国道、盛乐经济园区的工程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尔县文物管理所对土城子古城东、北、西城垣外侧分布的古代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经过清理发现，这批墓葬以战国、汉代、魏晋时期为主，另有相当数量的唐至金元时期的墓葬。战国时期墓葬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墓穴较为密集，但相互无打破关系，且南北向、东西向互不干扰，表明是同一种族同一时期埋葬地的延续，其中还发现有少量的屈肢葬。另外在墓葬中出土了较多的铜带钩，这些带钩由大到小，装饰由繁缛到简略，时代序列鲜明。汉代至魏晋时期的墓葬以带有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及长方形砖室墓为主，出土的随葬品较为丰富，有陶器、铁器、玉器多种，其中殉牲的现象多见，反映了地方的特色。唐代墓葬以土洞墓、砖室墓为主，较为重要

的是两座砖室墓的发现。一座为壁画墓，圆形墓室，穹庐顶，墓壁四周绘有精美的仕女图、门吏图、道士图等，这是在内蒙古土默川地区发现保存完好的唐代壁画墓；另一座为方形砖室墓，墓内出土一合墓志，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刘公墓志铭”，志文中明确地指明了唐代振武城的确切位置，这也是此次重要的考古发现。金代的墓葬只发现一座火葬墓，以石函盛敛骨灰，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在石函的顶盖上雕刻的“大定十一年”的年号款识，这与城内发现的大量金代瓦当相互印证，由此说明金代土城子古城沿用的具体情况。总之，对土城子古城城外大量不同时期墓葬的清理，与城内各个时代的遗迹相对应，进一步丰富了土城子古城的文化内涵^[72]。

2000年5~7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托克托县博物馆配合托克托电厂铁路专用线建设，对黑城乡黑水泉村南的2座汉代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现的2座汉代砖室墓葬规模宏大，形制时代特征明显。2座墓葬均呈“十”字形，属前、中、后及东西耳室的形制，根据墓葬布局以及出土的长方形陶案、方形陶灶、神树陶盆、器座等遗物推断，黑水泉墓葬的确切年代可定至东汉晚期。2座墓最大的特点基本上是正南北方向，并列而处，2座墓葬的东、西耳室之间仅相距1米，形制、规格基本上一致。由此可以判断黑水泉墓葬应是一处同冢异穴的夫妇合葬墓。夫妇异穴分葬的丧葬制度，表现的是夫妻间关系的加强，体现的是封建宗法观念的加深，这也正与墓葬中前、中、后三室之制的意义相一致，标志着东汉晚期内蒙古土默川地区大土地所有制的膨胀，封建庄园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73]。

1999年10~11月，配合包头市南绕城公路的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对张龙圪旦的部分汉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张龙圪旦汉墓群位于包头市郊区麻池乡古城村西约1.5公里处。这次发掘，共清理墓葬5座，包括中型砖室墓3座、小型砖室墓2座。墓葬为多室穹隆顶，结构基本一致。各墓内出土的随葬品不多，最有特点的是在随葬品中发现有牛头、羊头及一些牛、羊骨骼，还伴出有陶器、铁器、铜镜、铜车马器饰件、铜箭头和钱币等。墓内扰乱严重，尸骨散乱，个体数目不清。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初步判断，这批墓葬属于东汉中期和帝至桓帝、灵帝时期，出土的博局纹铜镜的镜背纹饰简化潦草，明显处于东汉晚期的衰变阶段^[74]。另外，在墓中随葬有牛头骨和羊头骨等殉牲的习俗在中原地区较为少见，而普遍存在于包头市、鄂尔多斯市等地的汉代墓葬中，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墓葬是归附汉王朝匈奴人的墓葬^[75]。此次发掘的这批墓葬，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文化特色，据此判断，张龙圪旦墓群的族属很可能是匈奴，这些墓葬应和南迁附汉的匈奴人有关。匈奴人在吸收中原墓葬形制的基础上，保留了自己游牧文化中固有的殉牲习俗，清理出的几座墓葬中共同出土有游牧民族所特有的铁刃器也佐证了这一说法。张龙圪旦汉墓的抢救性清理发掘，是初步尝试对土默川地区南匈奴墓葬进行的辨认与剔选，对于进一步研究内蒙古包头地区汉代墓葬的分期与族属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76]。

注 释

[1] 李逸友：《包头市郊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0期。

- [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元代集宁路遗址清理记》，《文物》1961年9期。
- [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959年呼和浩特郊区美岱古城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9期。
- [4] 辽中京发掘委员会：《辽中京城址发掘的重要收获》，《文物》1961年9期。
- [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县土城子试掘记要》，《文物》1961年9期。
- [6] 参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1997年。
- [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考古报告集》，远方出版社，2001年。
- [8] 见本书《达拉特旗草原村遗址调查》。
- [9] 汪宇平：《内蒙古伊盟达拉特旗瓦窑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1期。
- [10] 见本书《达拉特旗瓦窑村遗址》。
- [11] 见本书《托克托县后郝家窑遗址》。
- [12] 见本书《托克托县耿庆沟上游支流西沟与南沟沟畔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 [1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文物事业管理处：《包头纳太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1期。
- [14] 见本书《清水河县城嘴子遗址发掘报告》。
- [15] 见本书《卓资县城卜子古城遗址调查发掘简报》。
- [16] 《汉代的城邑与边塞遗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版。
- [17] 同[14]。
- [18] 李逸友：《内蒙古历史名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19] 同[16]。
- [20] 见本书《托克托县黑水泉遗址发掘报告》。
- [21] 俞伟超：《汉代的“亭”“市”陶文》，《文物》1963年2期。
- [22] 张郁、陆思贤：《呼和浩特市郊区二十家子汉代城址出土的封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2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呼和浩特市榆林镇陶卜齐古城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 [24] 陈永志主编：《内蒙古出土瓦当》，文物出版社，2003年。
- [2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的中城、北城、南城分别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初步了解了城内文化堆积的状况，资料待发。
- [26] 1956年5月，在古城的西门外清理了一座汉代壁画墓，详见罗福颐：《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新发现的汉墓壁画》，《文物》1956年9期；1974年，在托克托县哈拉板申村东古城曾出土过一枚“云中丞印”字样的汉代龟形纽铜印，详见李逸友：《托克托城附近的秦汉代遗迹》，《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1988年又在古城西门外发现了一件带有“云中”二字的汉代陶碗残片，详见文卿：《托克托县发现“云中”戳印残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1期；1995年10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古城周围的墓葬进行过清理，详见魏坚编著《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第四编第三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 [27] 内蒙古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介绍》，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

- [28] 崔璇先生等持第一种观点，详见《托克托县志》第十一编。李逸友先生等持第二种观点，详见李逸友编著《内蒙古历史名城》第二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李逸友：《呼和浩特地区古代农耕文明概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2期。
- [29] 石俊贵、刘燕：《内蒙古托克托县云中古城出土战国货币》，《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6年4期；王培义：《托县云中古城出土战国货币》补记》，《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7年3、4期。
- [30] 冯恩学：《金代长城的战争观》，《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 [31] 贾洲杰：《金代长城初议》，《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3、4期；克什克腾博物馆：《克什克腾旗金代界壕边堡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1期；达茂旗文物管理所：《达茂旗境内的金代边堡界壕》，《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1期。
- [32] 《金史》卷24《地理志》。
- [33] 《金史》卷93《仆散揆传》。
- [34] 《金史》卷95《张万公传》。
- [35] 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714~7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 [36] 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概说》，《内蒙古文物考古》4期，1986年。
- [37] 见本书《和林格尔县红山口遗址发掘报告》。
- [38] 陈得芝先生所推测的燕只哥赤斤所在地，位于今卓资县三道营乡土城村。参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后经李逸友先生实地调查考证，该古城为汉代武泉县城所在地，并非元代城址。参见李逸友：《论内蒙古文物考古》，《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39] 李知宴：《山西浑源县界庄窑》，《考古》1985年10期。
- [40] 见本书《察哈尔右翼后旗韩元店元代古城遗址》。
- [41] 孙利中：《呼和浩特古建筑时略记八十七座古城》，《呼和浩特文物》总第四期，1999年。
- [42] 邵国田：《赤峰敖汉旗出土元代纪年瓦当范》，《文物》1987年7期。
- [43] 同[37]。
- [4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元代集宁路遗址清理记》，《文物》1961年9期；参见贾洲杰：《内蒙古地区辽金元时期的瓦当和滴水》，《考古》1977年3期；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所见城市制度》，《北方考古研究》（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 [45] 徐莘芳：《元代的城址和窖藏》，《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 [46] 见本书《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沙尔沁古城发掘简报》。
- [47] 参见陈永志：《集宁路古城发掘集市窖藏、几千件瓷器囊括九大名窑》，《文物天地》2003年11期；《发掘集宁路元代城址及第三批窖藏》，《文物天地》2004年3期。
- [48] 包头市文物管理处等：《包头境内的战国秦汉长城与古城》，《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1期。
- [49] 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文物》1975年10期。
- [50] 见本书《东胜城梁段秦直道遗址发掘简报》。
- [51] 包头市文物管理处等：《包头境内的战国秦汉长城与古城》，《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1期。
- [5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四章《秦汉时代》，文物出版社，

1984年。

[53] 同 [51]。

[54]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汉代食俸亦有不同者，所辖郡县户籍数目大者或级别高者，所食俸禄级别亦高。

[55] 同 [51]。

[56] 见本书《包头市麻池三队遗址发掘简报》。

[57] 见本书《伊金霍洛旗王家坡汉代窑址发掘简报》。

[58] 乌兰察布盟博物馆：《和林格尔县前瓦窑沟辽、金时代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59] 《元史》卷一百《兵志·屯田》记：“忠翊侍卫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命各万户府，摘大同、隆兴、太原、平阳等处军人四千名，于燕只哥赤斤地面及红城周围，置立屯田，开耕荒田二千顷，仍命西京宣慰司领其事。后改立大同等处屯储万户府以领之。”亦参见卷十九《世祖记》。

[60] 《元史》卷24《仁宗纪》。

[61] 见本书《和林格尔县红山口遗址发掘报告》。

[62]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233~23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63] 冯恩学：《金代长城战争观》，《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64] 关于金界壕的文章主要有：王国维：《金界壕考》，《燕京早报》第一集；《观堂集林》卷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李文信：《金临潢路界壕边堡址》，《辽海引年集》，1947年；贾洲杰：《金代长城初议》，《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3、4期；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东北路界壕边堡调查》，《考古》1961年5期；庞志国：《金东北路、临潢路吉林省段界壕边堡调查》，《中国长城遗址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2期；张柏忠：《吐列毛杜古城调查试掘报告——兼论金代东北路界壕》，《文物》1982年7期；克什克腾旗博物馆：《克什克腾旗金界壕边堡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1期。

[65] 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界壕边堡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2期。

[66] 见本书《苏尼特右旗新民乡全胜段金界壕》。

[67] 陈根远、朱思红：《屋檐上的艺术——中国古代瓦当》，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

[68] 同 [1]。

[69] 《蒙古族简史》编写组：《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70] 见本书《包头市尔甲亥明代寺庙遗址》。

[71] 见本书《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窑沟村明代烽燧址的清理》。

[7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城外发掘清理了五百余座不同时期的墓葬。资料待发。

[73] 见本书《托克托县黑水泉汉代墓葬清理简报》。

[74]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

[75] 张海斌：《试论中国境内东汉时期匈奴墓葬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1期。

[76] 见本书《包头市张龙圪旦汉墓第二次发掘简报》。

达拉特旗草原村遗址调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达拉特旗文物管理所

1999年5~6月,配合210国道包东段(包头—东胜)的建设工程,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达拉特旗文物管理所在达拉特旗境内进行文物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草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现将草原村遗址的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地理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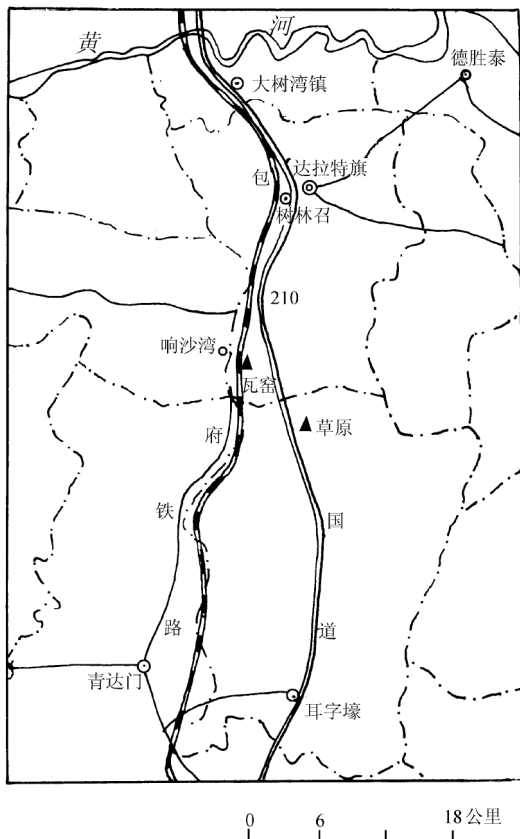
草原村位于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南约25公里处,南距耳字壕乡约20公里。村前有一条自然小河由东南流向西北,入罕台川后注入黄河。遗址位于草原村北约500米处的丘陵坡地上(图一;彩版一,1),面积约5万平方米。遗址所处坡地东高西低,沙丘起伏,破坏严重。地表散见较多陶器和石器残片。经大面积钻探勘察,地层堆积较薄,局部无存。

二、采集遗物

遗物均为地表采集,分为陶器和石器两大类。下面按类别逐一介绍。

1. 陶器

陶器多为残器,可复原者极少。陶质分细泥陶、夹砂陶、砂质陶三类,以细泥陶居多,夹砂陶次之,砂质陶较少。细泥陶的陶土多经淘洗;夹砂陶所夹砂粒细小而均匀,陶器胎壁亦较薄。陶色以红陶为主,红褐陶与灰褐陶略等,白陶较少。陶器的纹饰以素面磨光居多,绳纹和线纹略等,篮纹只发现一片。彩陶



图一 草原村遗址位置示意图

种类简单，有黑彩和红彩两种，纹样有宽带纹和弦纹等，另发现有红顶钵类器物。陶器的制法均属手制，主要采用泥片塑贴法和泥条盘筑法，个别陶器的内壁留有泥条盘筑痕迹。烧制火候较高。器形有钵、罐等。

钵 7件。均为细泥红陶。分二型。

A型 3件。均残，红顶。按口沿的变化，分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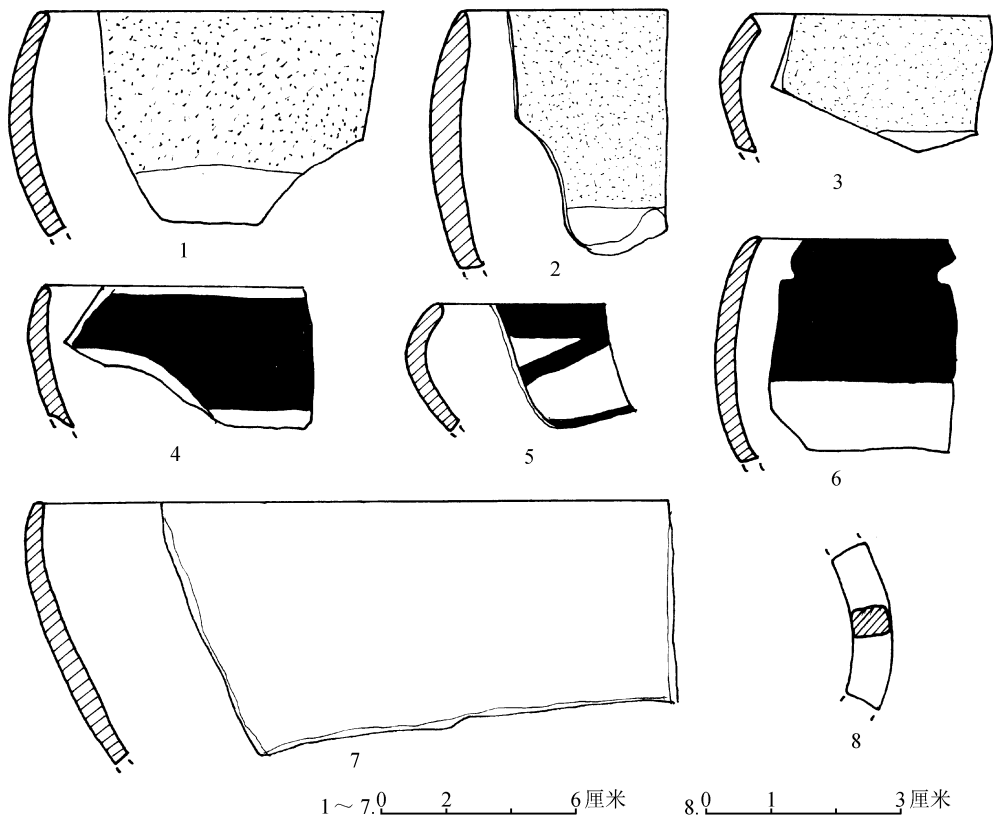
I式 2件。微敛口，圆唇或尖圆唇，腹微鼓。C:62，圆唇，腹微鼓，外壁磨光，内壁素面。口径28、残高6.8厘米（图二，1）。C:61，尖圆唇，腹壁弧鼓。外壁磨光，内壁素面。口径26、残高8厘米（图二，2）。

II式 1件。C:63，尖唇，沿面内折，鼓腹。外壁磨光，内壁素面。口径30、残高4.2厘米（图二，3）。

B型 3件。均残。按口沿的变化，分两式。

I式 1件。C:64，直口，圆唇，斜弧腹，下腹斜收。内、外壁均素面磨光。口径30、残高8厘米（图二，7）。

II式 2件。直口微敛，口沿外饰宽带黑彩。C:60，圆唇，斜弧腹。内、外壁磨光。口径



图二 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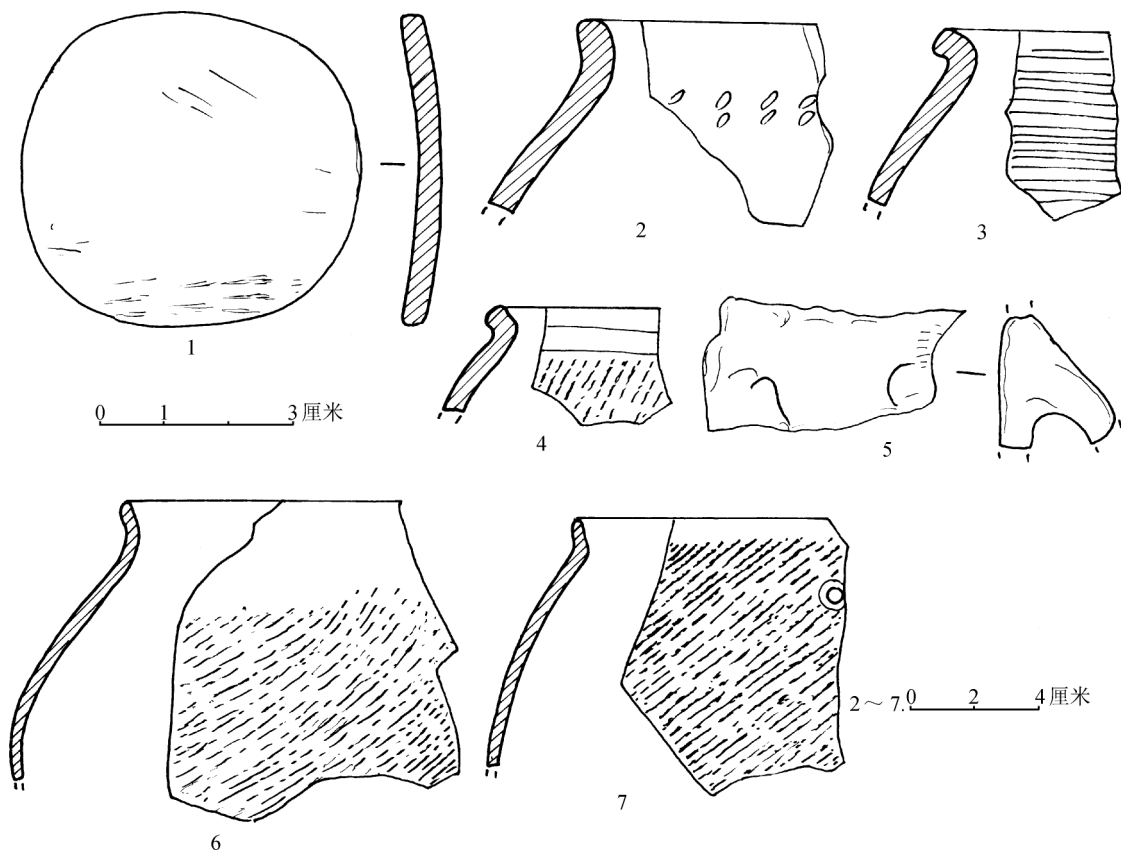
- 1、2. A I式钵 (C:62、C:61) 3. A II式钵 (C:63) 4、6. B II式钵 (C:60、C:66)
5. C型钵 (C:65) 7. B I式钵 (C:64) 8. 陶环 (C:33)

28、残高 4.4 厘米（图二，4）。C:66，尖圆唇，弧腹。内、外壁磨光。口径 30、残高 6.6 厘米（图二，6）。

C 型 1 件。C:65，残。圆唇，曲腹。口沿外饰一周斜线三角纹红彩，纹样不详。口径 22、残高 4 厘米（图二，5）。

罐 5 件。按口沿的变化，分四型。

A 型 2 件。均残，窄沿外侈，鼓腹，饰弦纹或绳纹。C:68，夹砂红陶，方唇，唇面有凹槽二周。通体饰弦纹。口径 24、残高 5.8 厘米（图三，3）。C:69，夹砂褐陶，方唇，唇面有凹槽一周。通体饰绳纹，颈部绳纹被抹断。口径 22、残高 3.6 厘米（图三，4）。



图三 陶器

1. 陶饼 (C:58) 2. B 型罐 (C:71) 3、4. A 型罐 (C:68、C:69) 5. 器耳 (C:74)
6. C 型罐 (C:73) 7. D 型罐 (C:72)

B 型 1 件。C:71，残。夹砂红陶，侈口，圆唇，折沿，沿面微弧，弧腹。颈部饰楔形坑点纹二周。口径 24、残高 6.2 厘米（图三，2）。

C 型 1 件。C:73，残。砂质灰陶，侈口，圆唇，折沿，沿面略外卷，鼓腹。通体饰绳纹，颈部抹断，薄胎，内壁有泥条盘筑痕迹。口径 16、残高 9.9 厘米（图三，6）。

D 型 1 件。C:72，残。砂质白陶，侈口，圆唇，窄沿，弧腹。通体饰绳纹，口沿外被抹